

揚州八怪年譜

扬州八怪
研究資料
丛书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扬州八怪研究资料丛书

扬州八怪年谱

(下)

● 陈 撰年谱 胡 艺 撰

● 郑 變年谱 王凤珠
周积寅 撰

● 华 岳年谱 薛永年 撰
● 边寿民年谱 丁志安等撰

● 杨 法年谱 胡 艺 撰
● 李方膺年谱 赵 鵬 撰

● 汪士慎年谱 蒋 华 撰
● 高 翔年谱 胡 艺 撰

● 罗 聘年谱 陈金陵 撰
● 闵 贞年谱 胡 艺 撰

● 李 蕤年谱 胡 艺 撰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第005号

扬州八怪研究资料丛书

顾问

启 功

谢稚柳

张安治

许莘农

主编

卞孝萱

副主编

薛 锋

周积寅

扬州八怪年谱(下)

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奉容县印刷厂印刷

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29.43万 开本1/32 850×1168mm

印张13.625 印数1—2000册

书号ISBN7—6344—0154—2/J.155

每册8.50元(平) 11.50元(精)

清中期扬州商品经济与扬州八怪

——《扬州八怪年谱》前言

薛 锋

我有一种看法：“扬州八怪”研究的高潮，是在二十世纪后期才掀起的。它的发展过程，可谓几经起落，有褒有贬，且是贬多褒少。只是我们对清末民初的有关中国画出版物查阅一下，便可清楚。其中的评价和选画，大都推崇“四王”，且已形成了清一代，在绘画领域里的审美主流，其偏见，一直影响到民国。如北平故宫博物院编的《故宫书画集》1—45期中，未选入一幅“扬州八怪”的作品；又如施翀编撰的《中国名画观摩记》的第六章，选入清代绘画二十八幅，其中只有清僧原济和王原祁合作的兰竹，并作评论道：“……四王吴恽之外，支流别派，殆无足述者矣。此次所陈列二十余帧，即四王吴恽之作，亦未能满足吾人之意，至可憾耳。”直至1950年8月，我国编印之《参加苏联中国艺术展览会古代艺术品目录》一书中，对“绘画类”之评述云：“……明清两朝只是保守着这种成法，而且逐渐变为形式，只有摹仿，而没有创作。……”可见在解放初期，美术史论界对“扬州八怪”之研究，仍尚未重视。

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，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由于去掉了“左的压抑和禁锢”，给美术史论界亦带来了新生和活力，故出现了对“扬州八怪”研究的高潮和新论述。举如：有人认为：“欧洲资本主义的新兴出现了文艺复兴的美术，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新兴，出现了扬州八怪以及后来崛起的上海派。”还有秦岭云先生在编著《扬州八家丛话》的引言中述：“所谓‘扬州八家’（旧称‘扬州八怪’），他们的思想作风和艺术格调，对

于当时的所谓正统文艺具有明显的叛逆性和独创性。他们的艺术实践，继承并发扬了民族优秀传统，在绘画史上发生了推陈出新，承前启后的作用。”等等。同时，又值我国实行开放改革，观念更新的时代，因此，对《扬州八怪》的评价，则愈来愈高，从而一变已往“贬多褒少”的陈旧思潮，这也是文艺发展史的必然结果。

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，不仅在中国，在世界各国都先后出现了很多研究“扬州八怪”的文章和专著。但很少对“八怪”，作全面而系统的形容，这可能是因为在搜集资料等种种方面，难度较大。现在，若将“八怪”十五家年谱编出，其必要性和及时性，在激励着我们的迫切感和责任感。为了作更深层的研究，我们对《扬州八怪》产生的基础，这个基本规律，必需掌握。它是产生在我们商业资本新兴之时，和在商品经济极为繁华的扬州。否则，是无“八怪”可言的。日本寺田隆信先生在《山西商人研究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正是由于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，扬州才在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”史实是这样。在我国明末至清中期，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是全国豪商巨富的代表，而他们之中，又要首推在扬州的两淮盐商。对此，我们在编写《扬州八怪》的各家年谱中，多有记述。在其履里、家世、交游、生平事迹、书画作品、题画诗跋、诗文著述等等的大量资料中，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人之间的关系，是相当密切的。有人说郑板桥拒绝为盐商作画，而且编出一些讹传的故事。其实，在郑板桥的“题画”中，就有“为马秋玉画扇”之诗，还撰写了大段题跋。在汪士慎的《巢林集》中，也有《吟两明轩盆荷、呈峰谷、半查主人》之诗。金农亦写有《忆康山旧游寄怀余元甲、高翔、马曰楚、曰琯、曰璐、汪士慎》，以及《马曰琯曰璐兄弟招同王岐、余元甲、汪埙、厉鹗、闵华、汪坑、陈皋集小玲珑山馆》等诗。金农还替大盐商马峰谷刻《马峰谷蕉叶研铭》。黄慎亦曾《寓维扬李氏园林》。还有陈撰，初主大盐商项氏，后改馆于盐商程梦星，晚年又应盐商江鹤亭之聘，馆于康山草堂。其他如华嵒、李鱓、高翔、高凤翰、杨法等，都是大盐商宴乐宾朋之

座上客。那时，盐商要靠书画家猎名风雅，书画家要靠富贾维生，其类例颇多。正如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述：“升平日久。海内殷富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英、徐良夫之风，蓄积书史，广开坛论，扬州有马氏玉秋之玲珑山馆，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，……名流宴咏，殆无虚日。”其时，各名园之主，竞相邀请文人书画家，“名流宴咏”，风靡一时。所谓名流，除“扬州八怪”外，尚有著名的文学家、诗人、戏曲作家、篆刻家等等。他们常常雅集于各个名园，故相互之间，关系颇深，交游亦广，其往来关系，在十五家之年谱中，虽有所编，然而毕竟是只言片语，且各具特点。对其时代的全貌和主流，还必须作一总的略述，读其梗概，再看各家年谱，便可更加清楚。

“东南繁华扬州起，水陆物力盛罗绮。”这是孔尚任写扬州的诗句，当时，扬州的繁华，正是扬州的商品经济兴起的。据记载，在扬州的两淮诸盐商中，除山西商帮外，以徽歙商人财势最大。徽商以明末到清中叶，称雄商界近二百余年，其经营地域之广，资财之雄厚，实为一时之冠。它与山西商人相仲伯，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而徽商又都是亦贾、亦儒、亦政的三结合体，它将我国商品经济推向了兴盛时期，并为我国资本主义之萌芽，拓开了道路。

明清时期的徽州，早就是一个“以贾代耕”的商人足迹，“几遍宇内”^①，以及，虽十家村落，亦有讽诵之声”^②的经济活跃之区和儒学昌明之地。其潜在意识是贾为厚利，儒为名高，因此，“贾而好儒”之风形成了徽歙商人的重要特色。据《五石脂》载述：“徽人在扬州最早，考其时代，当在明中叶。故扬州之盛，实徽商开之，……”徽商之儒风，将“商居四民之末”之沿习，“使徽俗殊不然。”“歙之业盐于淮南北者，多缙绅巨族，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，而读书登第、入词垣跻廊仕者，更未易卜数。且名贤才士，往往出于其间，则固商而兼士矣”^③“扬州八怪”就产生在这样一个“亦商亦儒”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。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呈

现出眼花缭乱的繁华,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感官刺激,它又冲击着长期以来的“重农抑商”的僵化规范,使不少官僚、士人弃官、弃文为商,这一社会变革的内在关系,促使封闭结构的封建性因素,在发展潜变。著名思想家戴震在扬州曾公开提倡“彰人欲”,也就是强调自我,和个性之解放。其民族心理结构,思维方式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观念形式,以及市民意识,都在剧烈的变化着。而“扬州八怪”即处于这一潜变的狂潮之中。

由于徽商的“贾名而儒行”,高标“雅好诗书”,对振兴地方文化艺术事业,或输资,或义助,大都不惜重金。如兴办或修建书院,乾隆元年(公元 1736 年)徽商汪应庚,见扬州府学——汪甘学宫,“岁久倾颓,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,辉煌轮奂,焕然维新。又以二千金制祭祀乐器,无不周到。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,悉归诸学,以待岁修及乡试资斧。”④时扬州之梅花书院、安定书院、敬亭书院、虹桥书院、广陵书院等十余所,均为两淮盐商之资助。书院之主讲者“皆知名有道之士。”⑤故四方文人,来扬求学者甚多,“扬州学派”中,著名的学者,如汪中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任大椿、段玉裁等,皆出于梅花、安定等书院。可谓极人材之盛矣。同时,徽歙商人对书籍刻印事业,亦有所贡献。史以刻印精美著称的康熙版《全唐诗》,即为康熙四十四年(公元 1705 年),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寅,奉命主持“扬州诗局”时所刊刻。《扬州八怪》中之汪士慎、金农、郑板桥、李蕤等之诗文集,就是由盐商出资刻印的。《冬心先生集》,则刻于雍正十一年(公元 1733 年),字体秀拔,刀法挺劲,可谓镂版中之精本。时官方和私家,刻印书籍之多,规模之大,质量之精,范围之广,实为前所罕见。

“新安多大贾,其居盐筭者最豪,入则击钟,出则连骑,暇则招客高会。……”⑥盐商之广建宅第园林。即为招客高会之所。文人书画家之吟诗、作画、写生、研讨,以及观摩历代名迹等,经常集于园中。故清人李斗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述:“杭州以湖山胜,

苏州以肆市胜，扬州以园亭胜，三者鼎峙，不可轩轾。其时，有名园十余处，并以城北为最集中。《浮生六记》的作者沈三白曾写道：

“癸卯春（乾隆二十八年），余从思斋先生就维扬之聘。渡江而北，渔洋所谓：‘绿扬城郭是扬州’一语，已活现矣。平山堂离城三四里，行其途八九里，虽全是人工，而厅思幻想，点缀天然，即阆苑瑶池，琼楼玉宇，谅不过如此。其妙处，在十余家之园亭，合而为一，联络至山，气势俱贯。”又诗云：“两堤花柳全依水，一路楼台直到山。”⑦

“扬州八怪”的十五位书画家，都是各园主经常邀请之客，参加各园诗文雅集之会。并为园林写屏联，题匾额，作园林图等。如徽商汪玉枢所建之“九峰园”、鲍志道所建之“西园曲水”、吴家龙所建之“锦春园”、易谐所建之“抱山堂”、吴均所建之“青棠观”、大盐商乔国桢所建之乔氏“东园”、两淮盐商贺君召所建之“贺氏东园”、郑侠如所建之“休园”，马曰琯、马曰璐所建之“小玲珑山馆”以及 陈敬斋所建之“梅庄”等等，如汪士慎曾画过《文峰夕照图》、李翫曾作过《虹桥揽胜图》等。郑板桥还为“梅庄”撰写过“梅庄记”。记曰：

“……广陵城东二里许，有梅庄，敬斋先生之别业也，先生性嗜梅，其家所植亦夥矣。……春明华放，主人载诗筒，陈酒罍，列茶具，或一人独往，以领其神。或与客偕来，以广其趣。诗歌赠答，篇章重叠，酒盏纷纭。至于霜栖月冷，冰魂雪魄，淡烟浮绕与内外，主人徘徊其下。漏点频催，不忍就卧，盖念梅之寒与同寒也。逮夫朝日将出，红霞丽天，与梅相映射，若含笑，若微醉。梅亦呼主人，与之割暄分暖，不独享也。主人与梅是一是二，认能辨之？……”

乾隆九年二月九日，汪士慎与诸好友泛舟，游览毕氏园林时，写诗云：

“古柳浮轻烟，微波漾罗縠。停篙一屐通，细雨沾春服。

香雪护山亭，丛篁依茅屋。小径碍人行，高林多鸟宿。娇花未聘姿，野客先游目。举酒开欢颜，狂呼成习熟。良时莫虚掷，好句须频读。”

由于“扬州八怪”经常雅集于园林之中，观察、写生、交流技艺。“红霞丽天，与梅相映射”，“娇花未聘姿，野客先游目”。故他们大都是以画花卉见长。加之园林中，亦常行诗会，故“扬州八怪”的诗文素养亦高，形成了绘画艺术更完美的“诗、书、画三绝”。

扬州八怪之艺术成就，还体现于艺术的各门类之间，必须相互汲其所长，相互启示，相互营养。“扬州八怪”喜观剧，爱音乐，还经常与戏曲家来往。当时，扬州的戏曲活动亦极旺盛。乾隆四十二年(公元 1777 年)，特命巡盐御史伊龄，在扬州设局，管理和修改曲剧。编成《曲海提要》二十卷，至今总目犹存。《扬州八怪》之一的罗两峰，就曾为著名戏曲作家蒋士铨所著《忠雅堂全集》九种曲中之《香祖楼》传奇，题七绝诗八首，并在首页写评文一篇。全集中之《第二碑》，罗两峰又为之题七绝二首。又如郑板桥常与剧作家金兆燕、王文治等友善。在汪士慎的诗集中，还写有《听孙淑林弹琴》以及《观走马伎》等等，他们常与戏曲作家厉鹗相互研讨。每当新戏试演时，“一时名士，常诣园中作琴樽之集，兼观新戏。对剧本音律、声韵、化妆、身段、道具、音乐等，从各个角度提出修改意见，加以订正。”⑧故在“扬州八怪”之绘画艺术中，其笔墨之运转，极富音韵之味，以及律动之明快感与节奏感，构成画艺的明显特色。

“扬州八怪”之书画艺术，其基本功力，尽皆厚实，这与盐商的藏书藏画，提供文人书画家阅读观摩之方便有关。如两淮殷富程晋芳，“……罄其赀购书五万卷，招致多闻博学之士，与共讨论。”⑨歙商姚际恒，“富收藏，著《好古堂书目》和《古今伪书考》”。⑩徽商吴绍浣，侨居扬州。“……嗜书画，精鉴赏，四方名迹多归之，如颜鲁公竹山联句，徐季海、朱巨川告身，怀素小草千

字文，王摩诘辋川图，贯休十八应真像，皆希世珍也。”^⑪

由于上述种种因素，全国各地文人墨客，纷至沓来，使扬州艺坛呈现出千姿百态，万壑争流之繁盛局面，尤其是画坛，在那商品经济极度繁华的基础上，商人之形象，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，已逐渐改变，除影响到市民意识之剧变外，且使文人书画家的作品，更进一步与商品化同步发展。故书画家之多，需要量之大，已极一时之盛。商人与书画家形成了鱼水之关系，相互需要，相互依赖。他们还依靠商人，经常随商船游览名胜大川，开拓心胸，一扫市井中之俗态。扩大思维，得以见多识广，刻意求新。故“扬州八怪”中之金农，有“足迹半天下”之举，黄慎亦往来于金陵、福建等地，郑板桥、高翔、高凤翰、李鱓、汪士慎等，亦常外游，罗聘亦曾几度北上。故很多著名书画家，大都侨居扬州。如“新安画派”的创始人浙江、查士标、汪之瑞等，还有皖派著名书画家戴本孝、梅清、萧云从、梅庚、巴慰祖、方士庶等，“金陵八家”之首的龚贤，曾经寓居扬州多年，以及时称“槎南二周”的昆山名画家周笠等，曾经寓居扬州多年，以及时称贬为“打底”的界画，亦有新的发展，它的再兴就发韧于扬州。其时著名界画家有李寅、萧晨、袁江、袁耀、颜峰、颜岳等等。这些著名书画家都与“扬州八怪”有或多或少的联系。他们创造出各种流派、各自风格、相互竞争、取长补短，且一变“文人相轻”之风为“文人相重”。他们在在中国绘画发展过程中，建树了又一个里程碑。

“扬州八怪”的成长、发展、以及活动的全过程，如果从华嵒生于公元 1682 年起，至罗聘逝世于 1799 年止，前后整整的有一百一十八年。

最后，我想再说一下，我们在编写“扬州八怪”各家年谱的过程中，对“扬州八怪”十五家的世系家谱，已经发现与搜集到的，共有李鱓、黄慎、高凤翰等，对其他各家未查阅到的世系和家族叙述，只有付之阙如了。但从清人笔记、丛刊、别集、诗文集等古籍和有关地方文献中，查阅到不少有关“扬州八怪”十五家之资

料,对其生卒年代、家族简况、生平事迹、交游、评述、记事以及题画诗跋。(包括部分国外收藏作品)等等,其内容与作品之真伪,由于诸多困难,未能逐一查考覆核。尤其是对生卒年,有争异者,我们详记各家之述,编于谱中。对其史实之编载,均注明资料出处,以便读者寻访查校。对未经注明创作年月之作品,只能以大致年限推定编之,如有差错,尚请方家正误。

今后还会陆续出现新的资料,若再版时,再作删改增补。

江苏美术出版社排除许多困难,决定编印这套《丛书》。这种重视学术研究的气魄,使得参与编写的同志,在怀着十分崇敬的激情下,决以高度认真地,不辞辛劳地,力求完美地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为己责,做到不辜负江苏美术出版社以及广大读者的期望。

注:

- ①引自歙县《丰南志》、吴士奇《从叔一公行状》
- ②万历《休宁县志舆地·风俗》
- ③《歙事闲潭》第十八册
- ④彭启丰撰《光禄寺少卿汪公事实》
- ⑤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
- ⑥《太函集》卷二
- ⑦沈三白《浪游记快》
- ⑧耿鉴庭《扬州昆曲丛谈》
- ⑨《啸亭杂录》卷九
- ⑩《歙事闲潭》第五册
- ⑪《丰南志》第三册

序

陈撰，字楞山，号玉几山人，浙江鄞县人。因其一生长期客居于扬州和仪征，故亦被定为扬州八怪之一。工诗善画，诗有逸才，天然高淡，不琢自雕。画工写生，水墨数笔，若不经意，而萧疏闲逸，品格极高。性孤洁，不因人而热，党悠然独处，如退院枯僧。

关于陈撰生平，过去研究者不多，有关的另星资料，虽然不丰不歉，但其中有记年的确实不多，加之他流传的画迹，存世亦稀，因此要编成年谱，困难实多。仅以陈撰馆于仪征项烟之玉渊堂，程梦星之筱园及江春之康山草堂为例，均无确切年月。目前只得稍作排比，仅能获得一约略时期。此外其与挚友交游，亦多无时地之记载，故亦只能暂时从略，以待后补。所以是编年谱，仅仅是极其粗略的一个初稿，发表如此，主要是希望专家及读者，不吝提供资料，以期再版时予以修正和补充。

胡 艺

目 录

清中期扬州商品经济与扬州八怪

——《扬州八怪年谱》前言	薛 锋(1)
陈 撰年谱	胡 艺(1)
华 翟年谱	薛永年(31)
边寿民年谱	丁志安等(127)
汪士慎年谱	蒋 华(167)
高 翔年谱	胡 艺(177)
李 菊年谱	胡 艺(209)
郑 叢年谱	王凤珠 周积寅(239)
杨 法年谱	胡 艺(327)
李方膺年谱	赵 鹏(337)
闵 贞年谱	胡 艺(361)
罗 聘年谱	陈金陵(375)

陈 撰 年 谱

胡 艺 撰

1678年(戊午) 清康熙十七年 一岁

陈撰生于是年秋冬之际。

按陈撰生年无明记，兹据考证，得知生于康熙十七年戊午(1678)，考证材料，请参阅拙稿《陈撰生卒年考略》。

又按《樊榭山房全集》(集外词二)载《瑞鹤仙·咏菊为楞山生日效蒋竹山体》词曰：“林皋寒近也，看鹿眼篱根，菊钱圆也。鱗鱗雁云也。又霜花凄紧，放秋归也。冰泉引也，望南山、烟嵒浅也。自义熙，开后重阳，甲子几番题也。……游也。倾壺细泛，冒雨幽寻，足清娱也。天随子也，和红杞、采将也，笑桃鬟杏靥，争春烘日，不似潭花寿也。祇金衣，黄鹄多情，舞裳伴也。”

据厉鹗词，得知陈撰当生于秋冬之际。名撰，字楞山，号玉几，又号玉几山人。

《国朝诗人征略》卷二十七载：“陈撰，字楞山，号玉几。”

《国朝先正事略》卷四十一载：“陈撰，字楞山，号玉几。”

《清画家诗史》丙下载：“陈撰，字楞山，号玉几山人。”

《扬州画舫录》卷十二载：“陈撰，字玉几，号楞山。”

按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将陈撰字与号颠倒，实误。浙江鄞县人，家世出自勾甬，久居杭州，后流寓仪征。

杭世骏《玉几山人小传》载曰：“玉几山人者，钱塘陈撰楞山也。自言鄮人，家世系出勾甬，居杭非一世矣。”

《墨林今话》卷二载《玉几山房诗画》曰：“玉几山人陈撰，字楞山。自言人，居杭州。”

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七十三载：“陈撰，字楞山，号玉几，鄞县人。”

道光《仪征县志》卷三十九载：“陈撰，字楞山，号玉几。浙江鄞县人，为钱塘诸生。”

《国朝画征录》卷下载：“陈撰字楞山，仪真人。”

《书画所见录》载：“撰字楞山，号玉几山人，仪征人也。”

《桐阴论画》三编上卷载：“玉几山人，鄞县布衣，侨寓钱塘，

寄居江都。”

按鄖即鄖县之古称，又按《国朝画征录》及《书画所见录》均谓陈撰为仪真人，实误。陈撰虽流寓仪征县，但未入籍。

有弟名在人，早卒，仅遗一女。

《玉几山房吟卷》载《岁晚杂述五首》第三首注曰：“亡弟在人，仅遗此女。”

同书又载《纪梦》题下注曰：“孟冬十三夜，亡弟在人作。”

侄婿许滨，字谷阳，号江门，丹阳人，亦工书画。

《扬州画舫录》卷十二载：“女嫁于南徐许滨。滨字谷阳，号江门，丹阳人。画入神品，与撰同馆文伯家。女死，翁婿意见遂不侔。”

《玉几山人小传》载曰：“玉几兄遗孤女慧而贤，嫁南徐许滨江门。滨亦雅士，画入神品，与玉几同馆江氏，哀弦中断，意见渐致参差，不可解也。”

毛奇龄(大可)五十六岁。

按毛奇龄生于明天启三年癸亥(1623)，下数至此为五十六岁。

乔莱(石林)三十七岁。

按乔莱生于明崇祯十五年壬午(1642)，下数至此年应为三十七岁。

诏举博学宏词，乔莱备顾问。

《曝书亭集》卷七十三《翰林院侍读乔君墓表》载：“十七年有诏举博学宏词被顾问，君被荐。”

黄鼎(尊古)十九岁。

按黄鼎生于清顺治十七年庚子(1660)，下数至此年，应是十九岁。

1679年(己未) 清康熙十八年 二岁

程梦星(午桥)生。